

牛撒捺文集

NIUPIENA WENJI 卷八 文化尊严

牛撇捺文集

NIUPIENA WENJI 卷八 文化尊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尊严 / 牛撒捺著. —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3

(牛撒捺文集)

ISBN 978-7-80764-726-3

I. ①文… II. ①牛…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2334号

牛撒捺文集·文化尊严(卷八)

牛撒捺 著

责任编辑 谭立群 田 燕

封面设计 晨 皓

排版制作 张 文

责任印制 刘 丽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40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9008

印 数 1500册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4-726-3/I·16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牛撒捺

本名朱昌平，甘肃皋兰人，1957年生于兰州。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副研究员。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兼任过《共产党人》杂志社社长，宁夏电视台台长。担任过的社会职务有：宁夏杂文学会会长，宁夏青年理论工作者协会理事长，宁夏青联常委，宁夏社科联副主席，宁夏新闻工作者协会（记协）副主席，宁夏第九届人大代表。

朱昌平长期从事理论行政管理工作，学术研究乃其业余爱好。他在学术上做的比较有益的工作，是对现代政治学的学习与探索。这方面，他发表过十数篇论文：《关于利益集团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大众传播在利益表达中的地位和作用机理》《强化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试论共产党紧密联系群众的政治学基础》

《论共产党紧密联系群众的社会学意义》《人民代表有限代表论》《舆论监督与廉政建设》《通货膨胀的非经济思考》等等。1997年出版论文集《非理性中的理性》。

朱昌平在学术上的另一片天地是经济学。曾发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西部地区的战略对应》《社会保险刍议》《略论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等论文。联合主编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回族文学史》等著作，主编过《中国西部经济》等著作，担任副主编的著作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行为研究》等多部。

20多年来，他发表学术论文、理论文章约百篇，主编、副主编、参编各类书籍30余部。数篇论文被收录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试论大众传播在利益表达中的地位和作用机理》一文被《新华文摘》刊发摘要；《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舆论监督与廉政建设》获全国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奖；《关于延安精神的几个问题》获全国党史学会十年优秀成果二等奖。另有其他著作与论文分别荣获宁夏社会科学论著二、三等奖多项，论文一、二、三等奖多项。

除了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朱昌平以牛撇捺为笔名发表了1000余篇杂文，出版了十二本杂文集，一本杂文选。朱昌平的杂文与杂文集多次获奖，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朱昌平是一位业余学术研究者，1994年评的副研究员后面带括弧，括弧内有“管理”二字，是“地方粮票”。他待在“学坛”与学术边缘，是一位边缘学人。

目 录 Contents

001	强化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008	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018	关于利益集团的几个理论问题
028	试论共产党紧密联系群众的政治学基础
037	论共产党紧密联系群众的社会学意义
045	通货膨胀的非经济思考
055	试论社会组织的人力放大功能
066	舆论监督与廉政建设
079	试论大众传播在利益表达中的地位和作用机理
088	简论“超前监督”中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096	西部地区发展中亟须解决的几个认识问题
105	传统文化断想
109	消除改革的历史阴影
117	关于延安精神的几个问题
130	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
144	初级阶段说的历史依据
15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
161	关于我区理论队伍建设问题的浅见
165	提倡间接理论判断
168	试论臧克家的诗歌形式观
177	来吧,朋友,请到文学“沙龙”里来吧
181	浅论王学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
186	杰出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
	——容闳
200	略论期望值

- 204 试析落后地区观念变革困难之原因
- 206 人民代表有限代表论
- 208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不科学
- 211 试论初级阶段理论的负效应
- 214 确立个人财产的法律地位
- 217 试论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 222 努力提高理论思维能力
- 225 进一步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
- 229 官僚主义二题
- 234 深刻认识和全面促进阶段性转变
- 237 对资本主义也要进行再认识
- 240 春天与我们同在
- 243 解放思想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 246 社会保险刍议
- 256 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行为的比较与借鉴
- 272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西部地区的战略对应
- 286 略论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 294 关于“讲学习”的认识
- 303 以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应对未来
- 306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
指导新闻出版改革发展
- 312 论文化尊严
- 321 牛撒捺作品名录
- 323 编后记

强化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本文拟对当前我国公民缺乏政治参与意识的原因及其应当采取的对策作一粗浅的探讨。

—

我国公民缺乏民主参与政治的传统，这当然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造成的。在封建社会，政治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普通百姓对政治无缘问津。这是历史发展的黑夜，世界各国都经历过这一磨难。如果说我国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一过程更为长久，封建社会对国民政治悟性的压抑和摧残更为严重，封建的政治文化的积淀更为深厚，对现代政治的发展阻力也就更大。还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发达国家，一般都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和洗礼，封建主义政治文化基本被涤荡殆尽，但在我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基本上被完整地递传了下来，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桎梏没有从根本上被打破，我们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打好。这是历史的缺憾。

虽然，对于今天的现实问题，历史固然应承担 responsibility，但一味

地把落后的根源归罪于历史和古人，也不是科学和求实的态度。最大的遗憾在于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并未在社会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等方面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没有下大力气去培养和唤醒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民主参与意识，没有很好地创造和提供让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和条件。我国公民对国事，尤其对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决策等不甚关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决策中的经验主义作祟。很多决策是靠领导层凭经验进行的，至多听少数专家和智囊的意见，并不注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并提供通畅的渠道，让公民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利益聚合，由此形成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决策。这种决策方式，使多数公民感到自己的努力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即便有想法、意见甚至治国兴邦的良策，也不一定能反映到决策层去。于是乎，只好三缄其口，至多发发牢骚了之。

第二，公民普遍缺乏“社会效应感”。他们从现行政治体制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感到，自己对政治的关心和参与将无足轻重。不管怎样，也不能有效地改变结果，不能对现行决策中的误漏产生纠错效应。在当前的社会现象中，我们常见的对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轻率和不经意，对民主考评干部等活动的冷漠和敷衍等心态和行为，就是公民缺乏政治效应感的突出表现。

第三，情感因素的制约久盛不衰。有一些人基于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和信任，认为党的决策永远是万无一失、不会错的，他们高度相信现行政治体系的决策具有不容怀疑的正当性、合法性、公平性和稳定性。这种认识抑制了自己的参与意识。这部分人的情感性因素太浓，而缺少现代理性思维和社会应有的审慎和批判精神。这种信任感，在通常情况下是对的，但是遇到像“大跃

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党内少数人决策失误的情况，就不能及时分辨，出现盲从，甚至推波助澜，酿成大错。所以，现代社会，只凭情感因素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对个人和社会都是危险的。

第四，有少数人囿于个人利益，对国事漠不关心，认为从其他活动中得到的好处比从关心、参与政治中得到的好处要多，因此，对政治采取漠然态度，形成了社会心理中的机会主义。他们从生活中感受到，参与政治活动所产生的感情、收入、安全、尊重、兴奋和其他价值远比不上读书、看球赛、聊天、下棋等活动。特别是人们对政治参与缺乏安全感，怕因言论、意见而获罪受难，这是“文革”等政治运动造成的直接和潜在的社会心理效应。

公民的参与意识的淡漠，已经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固然与决策层有最直接的关系，但与国民只知执行，不知参与和监督政治决策也有很大关系。一般地说，即使政策已经出台，也还可以根据实践去反馈信息，及时纠偏。但这方面我国公民做得很不够，有失公民的职责。所以说，改变现有的政治文化，包括情感、认知、价值取向等等，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非常重要的任务。

二

怎样才能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呢？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认为，如果人们属于下列情况，就有较大的可能参与和介入政治：重视可以得到的报酬，认为选择是重要的；相信自己能够帮助改变结局，相信如果自己不行动，结局将不会满意；拥有关于当前问题的知识或技能；只要克服较少的障碍便可行动^①。达尔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他所分析的对象主要是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其结论未必尽合我们社会的现实，但主要的方面却是相通的甚至是共同的，他的理论对我们同样有用。在参考他的结论时，需要注意的是，达尔所研究的西方社会的公民，民主传统更强，在“公民”这个意义上，有更多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以及独立见解。与之相比，我国国民的公民意识除了受个人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的影响之外，还受更为沉重的文化传统的束缚和由于体制的不健全而予公民的种种限制。考虑到这些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从我国的现实和公民的基本素质出发，在强化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当前应当做好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重大社会活动的决策方面，要更多地听取公民的意见和反映。尤其像工资、物价改革等与公民利益直接相关的决策与实施，更应当如此。要让人民群众充分地表述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并且通过党组织和工会等利益集团、大众传播媒介等渠道，广泛地收集公民的反映，以达到利益的科学聚合，即相同利益的综合和不同利益的协调，从而为决策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影响决策，达到公民参政的目的。

目前，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我们也有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的要求，并且某些方案也经过了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但客观上并未达到让全体公民多层次全方位参与政治的目的，参与决策的还只是少数人，或者说只是部分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人物。究其原因，在于公民表述自己见的渠道不畅通，下情不能上达，对决策、执行，监督、反馈过程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正当的利益要求，也只能以不正当的方式进行表达和宣泄。发牢骚，“骂娘”，怠工，悲观厌世，如此等等，已非常普遍。

十三大提出的民主协商对话制度在此方面虽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还很不够，还应开辟更多更通畅的渠道。对已有的渠道，如人

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协商对话制度，也应不断予以完善和发展，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是要提高代表的质量，使代表有比较高的参政议政能力，并能真正接近人民，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为选民负责，替选民陈言，表达选民的利益要求和愿望，使决策和行政机构能真正听到人民的呼声。二是要真正赋予人大以权力，并把人大真正同党和政府机构分开，成为独立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体现全体公民决策的原则。要使协商对话制度具有活力，关键在领导干部，而且是相当一级的、握有实权的领导人要不断与群众对话，而不能只让理论工作者去对话。

第二，要提高政治透明度。所谓政治的透明，就是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将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政治过程公开，让全体公民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公民才能摆脱对“黑箱”政策的神秘感和隔膜感，置身参与政治过程的氛围之中，逐步培养起主人翁自豪感、责任感和参与渴望意识与心理。政治公开化，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和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公开”这一点都做不到，公民连基本情况都不了解，还怎么参与政治过程，怎么影响政治的发展与变迁，更谈不上什么当家做主。毋庸讳言，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差，政治决策和整个政治过程异常神秘，公民既不明瞭某项政策出台的背景和依据，也不清楚执行过程中的效果和反应。有些情况外国人都知道了，我国广大公民还蒙在鼓里，新闻“出口转内销”乃是常有的事。其结果，不仅嘲弄了公民这一神圣的名称，也给我国的政治生活乃至经济生活带来了十分深重的灾难和损失。当前，就是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提高政治透明度，呼吁公民意识的复归和强化。

提高透明度，目前应当做的事主要是：其一，更好地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介，及时报道国家的重大决策，并认真收集各界、各利益集团即全体公民的反映。重大决策方案，先交全体公民讨论，然后再作决策。其二，建立人大旁听制度，让公民了解决策过程。其三，建立更加科学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渠道，减少中间环节，消除梗阻。现有的民主协商对话制度只是一种形式，应考虑建立更多的形式，如真正发挥工会、共青团、企业家协会、个体工商户协会等利益集团的功能等等。

第三，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政治学研究表明，公民的文化水平越高，越是拥有关于当前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和观察能力，就越容易介入政治。从这个角度考察，我国公民的素质偏低，文盲率居世界前列，而且在近几年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冲击下，新一代的文盲还在增多。公民文化程度的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80%以上的文盲集中在广大的农村。而且由于过去政治的封闭性和神秘性，使公民的政治常识与技能普遍低下。这就为实行普选、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评议政策等政治行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教育是根本，它不仅关系到经济的现代化，也关系到社会的民主化。目前我们一方面要搞好国民文化教育，并且把重点放在青少年身上，坚决避免造成新的文盲，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掌握现代文化的一代精英。另一方面，应当搞好公民意识的教育。这应当结合普法去进行，让公民了解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熟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学会运用这些权利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要求，并影响社会的决策。只有抓好了这两方面的教育，公民的参与意识才会呈良性发展趋势。经过几年几十年的努力，把目前我们的“群众社

会”，改造成为“公民社会”，^②实现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关键性转变。

第四，要建立公民议政参政的激励机制。这就是说，不但不能压制公民议政参政的意识和行为，而且应当建立一套能够激发公民意识，吸引和鼓励公民议政参政的制度和体系，鼓励公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表达对社会发展的愿望和要求，鼓励他们献计献策。对他们的参与行动，不唯保护，而且应当表扬和奖励。对在国家的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绩突出的还应予以重奖。让公民感到参与政治、为国家献计献策、对现实政策提出反馈或纠偏意见与科学研究和发明一样重要，一样于国于民于己有利。通过少数精英人物的参与，逐步带动绝大多数公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允许并鼓励人们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二，要真正以法治国，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民主权利，保证公民不因发表政治见解而遭迫害。在这方面，只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够的，必须使其含有法律的确定内容。只有这样，我们的政治决策和执行过程才能逐步趋向科学和合理，并逐步形成符合现代社会要求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良性政治运行机制。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

注释：

①见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②参阅《政治学研究》1983年第5期刘志光、王素莉《从“群众社会”走向“公民社会”》一文。“群众”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公民”则是法律定义，含义更加确切。

（载《陋铭理论家》1989年第3期）

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

政治现代化包括权威的理性化、结构的分化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较高。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的建设目标在富强、文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民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将推进民主化进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此意义上，政治学家和理论工作者呼吁强化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扩大政治参与。

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着来自参与扩大后所带来的困惑。政治研究表明，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参与的扩大如果没有制度化与之同步发展，往往会带来混乱，造成社会动荡。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动荡（包括我国 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荡）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常常陷入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要加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步伐，尽快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就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和现有国民素质基础上，

广泛的社会动员又使社会出现了一些无序现象（如罢工罢课游行的增加，中央政策的号召力减弱，等等），反过来又迟滞了社会历史的进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遇到的两难处境，而且越是急于摆脱它，它反而越是纠缠不休。

如何处理好参与扩大化与社会秩序混乱这一矛盾，准确地把握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速度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考察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演变过程后指出：“一个社会要保持高度的一体性，就必须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使更强有力、更复杂、更具有自立性的政治制度也得到发展。然而，政治参与的扩大往往一方面会瓦解传统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会阻碍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他还说：“……政治安定取决于制度化和参与的比例。要保持政治安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一个社会制度的复杂性、自立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也必须随之提高。”参与超过了制度化，社会必然会出现不安定。对此，我们应当作出怎样的选择呢？如果因为惧怕不安定而抑制参与，那么跨过过渡期、进入现代社会的进程就会变得漫长无期。这显然是全体国民所不愿意的。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参与扩大的同时，搞好政治制度化和政治体制改革。

制度化是至关重要的。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参与的制度化，即参与的有序化、法制化、合理化。也就是说，在强化国民政治参与意识、扩大参与范围的过程中，要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有秩序有步骤地从较少人参与到更多的人参与，从较少方面参与到更多方面参与。做到公众的参与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制度建设同向共振，协同发展。

在参与扩大的同时，加速政治制度化特别是政治参与制度化

并使其同步发展，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从理论上讲不难做到，但在实践中却往往难以解决好。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要么是大众参与问题解决不了（如非洲一些国家），要么就是大众参与后国家的安定甚至发展出现问题（如南美一些国家）。新中国 40 年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其间，有些时期我们对公众的参与很重视，但制度化不强，因此酿成悲剧。“文化大革命”连小学生都卷了进去，可谓动员广泛，参与范围非常之大，但由于目标的偏差和运动的无序，结果却成了一场摧残性的浩劫。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主化程度有所提高，参与扩大，但学潮频繁，并且酿成了 1989 年春夏之交的动荡。因此，要在参与扩大的同时保持社会的安定和持续发展，需要解决好理论和实践的一系列问题。特别在我们这个传统包袱很重，国民政治参与意识淡漠、经验缺乏、政治体制尚未深化改革的国度，更应统筹考虑，审慎行事。

二

政治参与的扩大，在转变时期所引发的负效应很多。就我国目前的状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由于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尚未彻底转变，对建立新体制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所要建立的体制心中无数，所以容易产生盲目的破坏欲。认为存在的统统是不合理的，都应当否定，推倒重来。在文化上容易形成民族虚无主义，在经济上容易犯急性病，盲目追求高速度，在政治上则容易把民主进程简单化，理想化。

第二，由于许多国民参与经验不足，初涉政坛，跻身高水平的参与时容易产生无所适从感，造成秩序的混乱。我国国民参与